

# 解读《威尼斯商人》中杰西卡的伦理困境

黄译瑶

浙江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浙江 金华

收稿日期: 2024年6月7日; 录用日期: 2024年7月31日; 发布日期: 2024年8月9日

## 摘要

《威尼斯商人》作为威廉·莎士比亚喜剧创作的典范之作, 其卓越之处在于构建了一系列具有深度剖析价值的角色群像尤其是角色杰西卡之塑造, 不仅体现了个体反叛精神与对自由的执着向往, 微妙地折射出对彼时社会规范及性别角色固有框架的质疑与挑战。文章通过解读杰西卡在面临性别伦理、亲子伦理和宗教伦理下的多重困境, 触及伊丽莎白时代女性群体所共有的社会困境——她们在既定社会结构的枷锁与日益觉醒的个体意识之间的徘徊与挣扎。

## 关键词

《威尼斯商人》, 杰西卡, 伦理困境

## An Interpretation of Jessica's Ethical Predicaments in *Merchant of Venice*

Yiyao Hua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jiang Normal University, Jinhua Zhejiang

Received: Jun. 7<sup>th</sup>, 2024; accepted: Jul. 31<sup>st</sup>, 2024; published: Aug. 9<sup>th</sup>, 2024

## Abstract

*Merchant of Venice*, a masterpiece of William Shakespeare's comedic works, excels in creating a gallery of characters with profound analytical value, with particular emphasis on the character Jessica, whose portrayal not only embodies the spirit of individual rebellion and an unwavering yearning for freedom, but also subtly reflects a challenge and questioning of the societal norms and entrenched gender roles of the time. This essay, through examining Jessica's multifaceted dilemmas amidst gender ethics, parent-child ethics, and religious ethics, touches upon the shared social predicament of women during the Elizabethan era: their confusion and struggle between the shackles of the established social structure and the increasingly awakened sense of individual

consciousness.

## Keywords

*Merchant of Venice*, Jessica, Ethical Predicament

Copyright © 2024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威尼斯商人》位列莎士比亚四大喜剧之林，以其情节之跌宕与人物刻画之鲜明著称。剧中关于契约的经典段落，经改编成为广为人知的儿童寓言，蔚为流传。该剧深涉诸如商法契约、法律伦理、女性地位与种族关系等多元议题，寓讽刺与教诲于喜剧之中。尤为值得注意的是，角色杰西卡对父权压制的果敢反叛，展现了对爱情与自由的不懈追求，其形象被视为勇气与进步的象征，广受赞誉。

然而，剧情推进至阖家欢聚的终章，杰西卡却流露出异样的哀愁——“我听见了柔和的音乐，总觉得有些惆怅” ([1]: p. 467)，此番情感反差，隐约指向深层未明之困扰。她在性别、财富、亲情与信仰的交织抉择中独行其道，自逃离父权至融入贝尔蒙特生活，历经变故、转型乃至理想的破灭，内心的波折与外界的欢腾形成鲜明对比，揭示了即便是喜剧的帷幕后，亦暗藏复杂人性的探索与省思。

## 2. 性别伦理的枷锁

### 2.1. 性别困境

在《威尼斯商人》的叙述架构内，杰西卡这一女性形象跃然纸上。不管是在和罗兰佐的恋爱关系中，还是面对社会对女性固有的观念下，她都展现着独立勇毅的女性形象。然而追求个体自由的背后，笼罩的是女性性别伦理困境。

杰西卡在这段恋爱关系中保持了难能可贵的理智与自省，她如同一位旁观者般清醒，明白“恋爱是盲目的，恋人们瞧不见他们自己所干的傻事” ([1]: p. 421)。并且，在两性互动的舞台中央，杰西卡主动驾驭着情感的航向，不仅精心设计私奔这一挑战传统的英勇举措，更是勇敢地付诸实践，一系列行动凸显了她作为独立自主女性的鲜明特质。罗兰佐则甘愿扮演倾听者的角色，响应她的引领。当罗兰佐自称为忠诚伴侣时，杰西卡并未立即给予肯定答复，而是坚持要求她的声音亦应被听见，这种互动模式展现了她在亲密关系中对自我表达与相互尊重的深切渴望。

至于杰西卡私奔时采用男装的策略，她深知女性在当时社会语境下所承载的羞辱性，这是必须遮掩的现实，但仍决绝行之，此中既包含了对性别界限的大胆跨越，又深刻反映了女性在争取自由与爱情道路上不得不面对社会的重重障碍。男装的穿戴，巧妙利用了社会对性别表征的传统预期，降低了他们逃逸行径的可察觉度，这一策略不仅令人对性别表演如何成为逃避监视工具的社会机制产生深思，也进一步丰富了杰西卡角色的复杂性与深度。

最值得注意的是，莎士比亚戏剧中的年轻女性在穿上男性服装后，在心理上和身体上都从传统女性气质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2]。从公众观念的恒定视角审视，性别差异被视为既定事实，他们不会像罗兰佐那般，被杰西卡的才智、勇气及魅力而重新评价她，更遑论接受其主导地位。社会伦理环境的顽固性，尤其在伊丽莎白时代下的伦理框架内，男性优越于女性的地位观念，是难以撼动的背景。杰西卡虽展现

出强烈的个人意志，却依旧无力扭转女性在广泛伦理环境中普遍低下的既定现实。

## 2.2. 婚姻伦理

罗兰佐巧用修辞贯穿文本，通过华丽的语言、坚定不移的誓言、丰富的历史文化典故，以及精妙绝伦的隐喻，彰显他对杰西卡的深情赞颂与挚爱。然而，这种语言艺术的成效似乎极微，未能完全消除杰西卡内心的不确定，这从杰西卡的独白中可见一斑：“正是在这样一个夜里，年轻的罗兰佐发誓说他爱她，用许多忠诚的盟言偷取了她的灵魂，可是没有一句话是真的” ([1]: p. 465)。理智的杰西卡早就明白这些花言巧语不能稳固她的爱情，也不能保证余生的幸福。走向婚姻的爱情必须要检验对方忠诚与真心。

两位女性角色杰西卡与鲍西娅皆坐拥可观的物质财富。鲍西娅在初次得知巴塞尼奥所借债务时，表现出明显的诧异。对于鲍西娅而言，三千金币简直是九牛一毛，她甚至愿意提供“二十倍于所需金额的黄金”以偿清债务。她们的丰厚嫁妆，不仅赋予了她们明确的经济价值，还成为她们行使女性权力的一种手段，将经济资本转化为社会影响力。然而，这份嫁妆同时也是吸引追求者的一大因素，它在婚姻交易中占据了核心位置。婚姻制度本身暗含着权利的转移，从父母对子女的监护转变为丈夫对妻子的全面掌控，其中丈夫被视作妻子的主宰。女性对伴侣忠诚度的关注，是当时社会对婚姻忠诚问题的普遍焦虑。尤其是在剧本末尾，交换婚戒的仪式时，男女双方对于忠诚与价值观念的差异被显著放大，揭示出在实际利益驱动的求偶行为与理想化的婚姻忠诚伦理之间的深刻矛盾[3]。

男主女从的性别伦理结构在当时是获得了政治法律和国家政权的支持的。尽管伊丽莎白时代见证了女性社会地位的某种程度提升，但实质性的权利缺失仍旧显著，尤其体现在法律体系对她们继承权和其他财产权益的忽视，同时法律框架进一步巩固了父权制度的权威。根据当时法律，女性不具备独立签订法律契约的能力，除非关乎日常生活必需；其经济所得并不归其个人所有，既无法作为诉讼主体维护自身权益，亦不受法律诉讼之威胁。任何她可能继承的个人财产，一旦步入婚姻，都将自动归属于丈夫，除非事先设有特别的保护措施。

作为一位理智且独立的女性，杰西卡深刻认识到，婚后她的所有财产将不可避免地转归罗兰佐所有。这不仅限于物质财富的转移，更意味着她本人也将从法律意义上成为丈夫的附属。而她刚从父亲的管制中解脱，旋即又陷入丈夫的控制之下，形成了另一种形式的束缚。加之对罗兰佐忠诚度的疑虑，私奔之后的杰西卡面临着理想与现实的剧烈碰撞，她对男性的美好憧憬与对婚姻的理想化构想逐一破灭，体验到了由自由梦想跌落至现实囚笼的心路历程。

## 3. 亲子伦理的困境

杰西卡的形象初登舞台即刻显现出对父亲夏洛克的反感及挣脱父权束缚的决心。夏洛克，作为杰西卡之父，严格遵循犹太教义以监管其女，营造出一种近乎苛刻的保护氛围。他因女儿行为中细微不当之处而厉声训斥，出门赴宴前详细指示杰西卡务必锁紧门户，并禁止她在听到音乐或喧嚣时靠近窗边窥视街上的基督教徒，以免受其影响。在此严密监控下，杰西卡被剥夺了与外界交流的自由，甚至观看窗外繁华夜色的权利，家庭环境因此变得压抑如同囚笼。更甚者，夏洛克对金钱的极端重视远远超过对女儿内心需求的理解，他曾以“牢牢栓住，勿使逃脱” ([1]: p. 419)的言辞，赤裸展现出其对控制而非关爱的态度。在这样严苛的规则、不尽责的父亲角色以及封闭的家庭环境中，杰西卡的成长背景充满了压抑与不幸。因此，她采取坚决且果敢的私奔行为，以求逃离这种几乎毫无幸福可言的生活环境，也就不足为奇了。

相较于鲍西娅，杰西卡对父亲的反抗显得更为决绝彻底。杰西卡把家比作“炼狱”，并发誓：“罗兰佐啊，你若能始终如一，我便决心终止心灵的挣扎，改宗基督教，成为你亲爱的妻子！” ([1]: p. 416)。

莎翁通过引用《圣经·创世记》中瑞秋携雅各私奔并盗取父亲神像的故事，强化了杰西卡背叛夏洛克的情节，这与她变卖母亲绿松石的行为遥相呼应，展现了她对父亲深重的反叛与不满。杰西卡对夏洛克的憎恶显而易见，她认为身为夏洛克之女是一种耻辱，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因罪孽而承受此般惩罚。尽管她深知爱情或能使智者盲目，但她毅然选择冒险追求爱情，而非继续背负作为夏洛克女儿的身份。剧中通过杰西卡私奔的行为，间接批判了她对父亲的背弃，因为在与罗兰佐逃亡的那一刻，她已主动放弃了作为女儿的职责。这一情节深刻揭示了夏洛克与杰西卡之间伦理冲突的核心所在：个人自由与女儿身份义务之间的艰难抉择。

然而，即便在诸多冲突与对立的笔触中，文本亦微妙地透露出夏洛克对杰西卡潜藏的爱意。他对待女儿的态度并非全然的粗暴与压制。当葛莱西安诺以尖锐的言辞攻击夏洛克，声称自己虽爱妻，却宁可妻子去世，以求神灵惩罚这个“犹太恶犬”的心性时，夏洛克以愤慨的反驳揭示了对女儿的另类关怀：“这些便是基督教徒的丈夫！我虽有一女，我宁肯她与盗贼的后裔结缘，也不愿她委身于任何基督徒！”（[1]: p. 458）葛莱西安诺对妻子的轻蔑与无情，反衬出夏洛克对葛氏言论的震惊与反感，后者拒绝以自我牺牲为代价，却愿意以牺牲妻子的福祉为赌注，祈求神力惩治敌人，这无疑暴露出当时社会对女性根深蒂固的歧视与漠视。在这样一个男性主导的社会结构里，丈夫往往忽视妻子在婚姻中的地位与感受，婚姻成为从父母监护权向丈夫监护权的转换，丈夫成了妻子的主宰。尽管在家中享有绝对权威，丈夫仍被期待承担起保护家人安全的责任。夏洛克看到基督教丈夫如此对待自己妻子更加剧了他对基督徒的敌意。

在夏洛克严格的监护下成长的杰西卡，按理应成为他宗教信仰的忠实继承者，而非屈服于异教徒的信仰。然而，夏洛克在激烈的反驳中所流露出的，是对女儿未来幸福的深切关注。即使如夏洛克这般尖酸刻薄，内心深处亦渴望女儿能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杰西卡所描述的“地狱”般的家，或许在漫长的岁月中也偶尔透进过几束温暖的阳光，那是父亲以自己独特方式表达的爱。这种爱，尽管混杂着偏执与控制，却也是那个时代背景下，一个父亲力所能及的保护与期待。

#### 4. 宗教理论的冲突

通常，人们将宗教伦理解为在宗教领域和宗教活动中，由特定的信奉者群体遵守的、从特定信仰体系里引申出来的一套伦理观念和规范、仪式仪规的系统；它与政治伦理、经济伦理、环境伦理等一样，属于一种特殊领域和特殊活动中的伦理，即一种特殊的伦理形态，其实质在于以神圣的信仰为根据来建立道德行为的准则。

拥有犹太血统的杰西卡，与非犹太裔丈夫罗兰佐的私奔，踏入了一个对犹太社群弥漫着敌意的基督教环境。在面对一群公然蔑视其犹太父亲的基督徒时，杰西卡保持沉默，这也是她内心的挣扎。仆人朗斯洛特曾经戏谑杰西卡的宗教转变，称其可能会意外地促进猪肉市场的繁荣，这一插曲虽幽默，却也微妙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中宗教差异与偏见的普遍性。

值得注意的是，杰西卡在文本中的行为和情感表达，并非指向对整个犹太民族的反感，而是针对其作为夏洛克女儿这一特定身份的不满与束缚。她的信仰转变，更多是出于对个人自由的极度渴望，以及对逃离其父权制家庭中夏洛克专横压制的迫切需求，而非对宗教本身的主动摒弃。历史上基督教与犹太教长期存在的深刻分歧与冲突，历经数百年，已深深植根于社会文化 with 个人意识之中，这一背景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杰西卡抉择复杂性的理解。

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分离是各方面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既有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内在冲突的影响，也有罗马帝国宗教政策的影响[4]。基督教之所以能迅速扩张，部分原因在于其接纳了跨越民族与种族界限的信徒，展现出普世性的信仰包容性。而犹太教因其严格的律法体系难以被广大民众普遍接受，与基督教对耶稣基督弥赛亚身份认知的日益分歧，逐渐在基督教文明的蓬勃发展势头下边缘化。再加上罗马帝

国的政策干预，至公元 1 世纪末，基督教已正式从犹太教中分化，成为一个独立且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宗教实体。

随着基督教的广泛传播，两宗教间的信仰分歧演变为不可调和的矛盾，触发了持久的冲突，并最终导致了耶路撒冷这座犹太人眼中的圣城遭到毁灭性打击，标志着犹太人进入流散与复国愿望的漫长历史周期。即便面临生死考验，犹太民族依然坚韧地坚守其宗教信仰，拒绝向基督教屈服，展现了一种逆境中愈挫愈勇的精神韧性。历史证明，外部的压迫非但未能削弱犹太教，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其内部的凝聚力与生存意志，成为其文化遗产与宗教身份认同不断强化的催化剂。

考虑到犹太人转向基督教信仰的可能性似乎极其有限，这一选择不仅意味着皈依者需直面与自身信仰体系相悖的群体，还需面对曾对犹太先祖施以迫害的历史罪行。尤为难忍的是，基督教世界与犹太民族之间偏颇与误解并未随时间消减，至今依然严峻，这表明杰西卡若选择基督教，即是步入了一个对自身原有族群持有潜在敌意的领域，这无疑加剧了其选择的复杂性和心理负担。因此，杰西卡为爱转变宗教信仰，是一个重大的个人牺牲，这一决定使她无法完全融入当前环境中的集体情感共鸣。尽管她所在的场景最终以众人欢聚一堂而收尾，符合她的深切期望，但独独她，这位新近加入且身份敏感的成员，需适应这一全新且陌生的社群。在面对那些曾对她的父亲持有敌意甚至造成伤害的人群时，杰西卡内心承受着复杂的道德与情感纠葛。

作为文艺复兴时期的灵魂旗手，莎士比亚无疑能洞察到了两大族裔间剧烈的对立现状。犹太人历来在欧洲受歧视，英国从世纪以来就有过几次排犹活动。在当时欧洲的戏剧中，犹太人的形象已成定型，一般都是遭人厌弃和唾骂的恶棍，加上当时英国这样一股反犹浪潮，莎士比亚要在自己的作品申写到犹太人，就不可能把它处理成正面形象<sup>[5]</sup>。但秉承人文主义和基督教宽容精神，莎士比亚为杰西卡这类良知尚存的犹太人探索了一条出路，即信仰的转变。他坚信犹太人同为人类，享有生存与尊严的平等权利，因此任何形式的歧视与压迫均被视为非正义且不应存在。夏洛克在法庭上的辩词，映射出莎士比亚的深刻洞察与情感，赋予了这些对白格外的力度与感染力，使之成为剧作中的亮点。法庭最终判决夏洛克皈依基督教以逃脱死刑，这一安排反映了莎士比亚对于基督教仁爱与宽恕理念的推崇。然而，他在宗教立场上的抉择亦显露了内在的困境与矛盾，这是一重未能全然化解的难题。宗教间的张力与冲突，在莎士比亚看来，是难以调和的，而他所能提出的解决方案，尽管充满理想主义色彩，却也是在当时环境下他所能设想的最佳途径，体现了其对人性、宗教与社会矛盾深刻而复杂的思考。

## 5. 结语

在《威尼斯商人》的尾声中，杰西卡的情感轨迹呈现出显著转折，由起初对罗兰佐的倾慕与热忱转为对其言辞背后所隐含意味的不满，甚至在欢愉乐章中仍流露抑郁，这一态度的逆转激发了观众的深刻思索。置于莎士比亚时代的社会背景框架内，这一转变凸显了杰西卡作为早期女性在严苛伦理环境中的独立意志力：她在两性互动中追求平等，甚至意图利用个人财富优势在婚姻关系中确立支配地位。然而，当时的伦理体系将女性身份限定于父权结构内的从属地位，无论杰西卡的个人意志多么坚韧，她都难以突破这层伦理的枷锁链。

此外，作为女儿的她内心对父亲夏洛克怀有复杂情感，既有逃离压迫的渴望，又难以割舍血浓于水的亲缘联系。文本细节中不乏夏洛克对杰西卡深沉而微妙的关爱，这可能在她心中激起对背离行为的微妙悔意。最终，鉴于犹太人对忠诚的坚守以及两种信仰间不可调和的深刻分歧，杰西卡的宗教转变不仅意味着对个人信仰的重塑，也可能令其置身于新的社会与心理困境之中，再次印证了个体选择与时代伦理张力下的复杂交织与挣扎。

总结而言，个体女性的强大力量在宏观社会结构、宗教框架和伦理环境的压制下，显得力有未逮。

莎士比亚剧中所刻画的勇敢、自信、自立的女性形象，实质上是对父权社会背景下女性潜能的一种颂歌，展现了她们不凡的力量与抗争精神。然而，这一角色的发展轨迹受限于其所处的社会与宗教背景，一定程度上也缩小了作者在创作中对人物深度与广度的挖掘潜力，体现出作者在时代局限下的无奈。这不仅反映了文学作品作为反映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其内容与形式上的局限性同样映照出历史与文化的特定约束条件，验证了文学作为现实主义表现载体的本质属性。

### 参考文献

- [1] 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全集[M]. 朱生豪, 译. 北京: 译林出版社, 1998.
- [2] Newman, K. (1996) Reprise: Gender, Sexuality and Theories of Exchange in *The Merchant of Venice*. In: Wood, N., Ed., *The Merchant of Venice*, Open UP, Philadelphia, 102-123.
- [3] 刘婷. 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的伦理冲突[D]: [硕士学位论文]. 重庆: 西南大学, 2019: 24.
- [4] 姚宇兰. 试论早期基督教与犹太教的关系[D]: [硕士学位论文]. 开封: 河南大学, 2008: 38.
- [5] 陈惇. 莎士比亚与基督教——从《威尼斯商人》说开去[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95(5): 57-63.